

徐则臣

作品

莫尔道嘎

莫尔道嘎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莫尔道嘎 / 徐则臣著. -- 成都 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8.7
ISBN 978-7-220-10804-4

I . ①莫… II . ①徐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13305号

MOERDAOGA

莫尔道嘎

徐则臣 著

策 划	徐晓亮
责任编辑	张春晓
整体设计	张 妮
责任校对	韩 华
责任印制	祝 建
出版发行	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	http://www.scpph.com
E-mail	scrmchbs@sina.com
新浪微博	@四川人民出版社
微信公众号	四川人民出版社
发行部业务电话	(028) 86259624 86259453
防盗版举报电话	(028) 86259624
照 排	最近文化
印 刷	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	143mm × 210mm 1/32
印 张	11.5
字 数	270 千
版 次	2018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20-10804-4
定 价	58.00 元

■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出版社联系更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

徐则臣，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，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供职于人民文学杂志社，著有《耶路撒冷》《王城如海》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《青云谷童话》等。

曾获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、冯牧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，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德、英、日、韩、意、蒙、荷、俄、阿、西等十余种语言。

自序

徐则臣

写了二十一年，如影随形折磨二十一年的，不是写作的难度，不是创新、求变，不是让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好的焦虑——这些都算不上折磨，就算是折磨，那也是痛并快乐着；折磨来自虚妄，来自意义：二十一年来，意义像条狗一直凶猛地追在身后。对意义的追究常导致虚妄，成了我的写作中间歇性发作的“偏头疼”，这头疼排山倒海、桀骜锋锐，经常让生活也跟着偏瘫。我必须想方设法寻求支持，把空荡荡的事关文学信心的量杯灌满，才能让生活重新站直了，平稳地往前走。

为什么要写？写这些有什么用？拿起笔，打开电脑，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两个问题。我必须先把自己说服了，故事才能启动。所以，每一个小说，不管长短，第一句话之前我都得像头拉磨的驴子在房间里转很多圈，直转到那口气上来了，足了，坐下来开始干活儿。也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极少回头看自己的作品，绝大多数写完了、改好了、送出去，从此就不再看。我担心突然又找不到那个“意义”。那失重的虚妄感是如此狂暴，如同一闷棍迎头砸来。

很多人会觉得可笑，一个活儿干了二十多年，竟然还解决不

了“为什么干”的问题？说来惭愧，这病我一直没法根治。写作干的就是件说服别人的事，但讽刺的是，我最大的问题在如何说服自己，说服自己写作这件事值得做，眼前的这个东西值得写。二十一年来，我不知道我的作品多大程度说服了别人，说服了多少人，但我知道我多少次勉强说服了自己。这三本集子里的这些小说，就是勉强说服自己之后，赶紧趁热写出来的。

这些年，关于文学我说了一些貌似嘹亮正大的道理，好像我对文学有多少正解，其实，这所有的道理都是我跟自己搏斗的结果，我曾用它们说服过自己。我得让自己先信，然后去做。

有一年我去拉美，抱着一本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小说跑了好几个国家。每到一处都要谈文学，谈得我后背发凉、内心发毛，虚妄之症突然就犯了。一本小说，值得穿过大半个地球么？值得穿过大半个地球去说它么？我都想直接从讲台上下来。出于礼貌，我把自己摁在座位上，深呼吸，继续谈。谈不了自己我转而谈起了拉美文学。谈墨西哥的胡安·鲁尔福、富恩特斯、帕斯，谈哥伦比亚的加西亚·马尔克斯，谈智利的米斯特拉尔、伊莎贝尔·阿连德、波拉尼奥，谈阿根廷的博尔赫斯、科塔萨尔。

碰巧这几个国家我都去过，谈着谈着我的腰杆就挺起来了。我发现，我对这些国家的所有理解几乎都建立在上述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上，行前突击恶补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种资料和旅游指南小册子，全然记不起一句，能想起来的对于该国、该地的历史、风物与人情的知识，皆出自那些伟大作家和诗人之手。在他们的小说、散文和诗歌里，一个国家最真实可靠、最丰沛动人的细节被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下来。假如理解一个国家需要一幅地图，最有效的，也许并非那种花花绿绿画了无数线条、遵循某种严苛的比例尺的地理之

图，而是文学，是小说、散文、戏剧和诗歌。我的声音里立马就有了理直气壮。至少那阵子的突发性偏头疼治好了。

文学跟GDP永远也扯不上关系，文学也降低不了房价、抑制不了通货膨胀；读完一篇小说我们该刷牙还得刷牙，该吃饭还得吃饭，它连一截牙膏和一碗稀饭的价值都不具备；但是，它能让我们想起GDP，想起房价、通货膨胀，想起牙刷牙膏稀饭馒头和咸菜，它还能让我们想起这些之外的所有东西，想起整个世界。还有什么能比唤起对整个世界的好奇与回忆更大的意义？

兜了一个大圈，我终于再一次找到个有效的方子。写作要克服偏头疼，出版集子更得克服这个毛病。赶上这三本集子的编选，是个大事，我无论如何得对自己说OK，要不下不了印刷厂。这三本集子囊括了二十一年里写作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，它们也许没有能力让读者想起整个世界，但它们确曾真诚地试图去呈现我所理解的那个世界，关于故乡的，关于花街和运河的，关于北京的，关于长长久久的各种疑难和在路上的。

我知道我对“意义”的理解过于狭隘，因为，于作者的意义只是作品意义的一部分，还有另外一部分，在读者那里。亲爱的读者朋友，那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。谢谢！

2018年6月14日，安和园

| 目录 |

梅 雨	001
夜 歌	021
长 途	096
莫尔道嘎	142
我们的老海	156
祁家庄	175
石头、剪刀、布	186
霜 降	212
南京，南京	228
天上人间	284

梅雨

1

十四岁那一年我过得懵懵懂懂。除了背上书包去五里外的中学念书，其余时间都待在家里，或者坐在石码头上。有很多船从运河里经过，我都没看清楚。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，心里长久地乱糟糟的，无数种荒草在里面疯狂地生长。什么都做不了，也不想做。上下学我不再骑自行车，跑或走，闷着头一个人独来独往。我喜欢进了校门和回到家里时一身汗的感觉。流了汗我觉得仿佛得到了自由，整个人不再被禁锢在衣服里，而是和整个世界息息相通，通透了，身体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活起来了。我跑或疾走，流汗。下雨天也不例外。印象里那一年梅雨天出奇地长，似乎一半时间都笼罩在大大小小的雨里，我湿漉漉地流汗，所有人家的衣物和棉被都长了霉。

花街在这一年里没有什么变化，除了出现一个女人。她在雨季的前一天来到花街，梅雨快结束的时候死了。我想讲的就是她的故事。

老人说，别对着运河发呆，水鬼要抓小孩。我不是小孩。大人了。他们都这么说，栋梁和五百，我同学。放学后我背着书包去

学校的厕所撒最后一泡尿，一排子人站在便池前又摇又抖。栋梁弯下腰伸长脖子在我旁边四处瞅，然后叫起来，他长毛了！他长毛了！很多人冲到我面前我才知道他说的是我。栋梁一脸坏笑，五百和其他人也跟着叫嚷和怪笑。他是男人了！他们说我。我突然紧张起来，尿撒了半截就提上裤子，裤裆里湿了。我的脸红得像小偷，全身可能都红了。他们大喊大叫。我知道他们其实早就长了毛，私下里男生们都在说，但为什么他们偏偏对我感到惊奇和兴奋，好像他们是清白的。然而当时我惊恐地提上裤子时，的确觉得只有自己才可耻。所有可耻的人一起讨伐你的时候，他们似乎就清白了，干净了，而你成了唯一可耻的人。十四岁的下午我第一次发现这个道理。此后的多少年里，我一次次地感觉到自己的可耻，尽管事实上我可能比所有人都更清白。我跑出厕所他们跟在后面继续叫，见到女生叫得更起劲。我想我完了，有一个女生知道了，所有女生也就都知道了。我鬼魂附体似的狂奔，五里路没停歇到了石码头上。坐到石阶上时，心脏在嗓子眼里跳，眼泪和汗水一起流下来。老人说，别对着运河发呆，水鬼要抓小孩。跟我没关系。我坐在那里如同屁股生了根，直直地瞪着一大片水和船，两眼里是空的。来来往往的人走过我也不让路。

我不是难过，也不愤恨，是什么我不知道。真要找点什么，那只能是空白。就像没有船驶过的宽阔水面一样。

风把我吹干了，天依然热，夕阳落了一半，石码头上忙起来。船和行人该来的来，要走的走。绛红色的光铺满半边运河，另一半是黑的，远处雾气升起来。一艘船摇着铃铛靠上码头，插在并排的几艘船中间的空当里。一个女人拎着巨大的皮箱上了岸，左手里还有一个鼓鼓囊囊的包。有三十岁？我不知道，我向来猜不准别人的

年龄。她在第二个台阶上停下，清冷地站在水边扭着身子往回看，船夫在数钱。她慢慢地把脸转向花街的方向，傍晚的光像温润的丝绸拂过她，那个柔美的脸部的弧度让我有点恍惚。我觉得一定在哪个地方见过这张脸。我歪着脑袋盯着她看，清晰地感到汗水蒸发之后留下的琐碎的结晶盐。她用右手小拇指把眼前的一缕头发挂到耳后去。她的右耳朵是透明的。我在哪里见过她。要么就是在过去的某个时候，有人对我说，不要在水边和一个坏女人站在一起。为什么坏，我也不知道。

她的脸清冷。当她看见我的时候，对我笑了一下，露出了一口白牙齿。然后牙齿消失了。我赶紧把目光躲到一边去。她的那个笑说明我们是陌生人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。那是对陌生人的笑，或者说，是面部表情的一个调整，而碰巧我坐在这里。我既失望又坦然，这样的情景在我时常发生，莫名其妙就会在某个时候觉得眼前的事情发生过，几乎是一模一样，像做过的梦一样。所以我推测，在过去的十三年里，我一定做了无数的我记不起来的梦。

那个女人经过我面前时磕绊了一下，最后一个台阶对她的大皮箱来说有点高。我帮她扶住箱子，屁股还是没动，我挡了她的路。我看她衣服的左胸处绣了一朵小玉兰花，然后我闻到了幽幽的玉兰花香气。

“谢谢，”她说，“这就是花街？”

她的声音听不出来是哪里人，我敢断定离这里不是很远。我点点头，往身后指了指。码头饭店旁边的巷子进去就是花街。其实我还想问她要找谁，因为街上所有人我差不多都认识。但最终没吭声。我羞于开口，也有点怕。

坐到晚饭时我才回家，父亲正给别人针灸。他在家里开了间私

人诊所，花街、东大街、西大街，甚至更远地方的病人都会赶过来找他。据说我父亲医术不错，中医西医都拿得出手，好像还有几手绝活和偏方。深的我不懂，我只零散学了一点皮毛，头疼脑热的也能给人下点药。父亲不在家这事就归我干。日常用药就那几种，即使医不好病也不会把人治死。父亲有用酒精棉球擦手指的毛病，这和他的一丝不乱的分头一样，培养了我对男医生的基本想象，以后的多少年里都没能改掉。父亲让我去看他针灸，我转身去了另一间屋，那病人瘦骨嶙峋的后背让我打了个抖，觉得冬天提前到来似的。

母亲在做饭，见到我就开始训。训我只是一个做母亲的习惯而已，见到我迟归就忍不住想说两句。自言自语也要说。整天游魂。我告诉她，就是在石码头上看船，没跟别人打群架。母亲哼了一声，早晚也不让我放心，跟你爸一路东西。她总是对我父亲充满仇恨，顺便把我捎带上。如果我还有一个哥哥或者弟弟，或者祖父还在世，他们应该也逃不掉。男人都不是好东西。花街上的女人都这么认为。所以她和父亲总是吵架。饭桌上说得好好的，我盛一碗饭回来他们可能就吵起来了。一旦这时，母亲就会说：

“花街，该死的花街！”

父亲就低声对着我耳朵篡改母亲的话：“男人，该死的男人！”

花街被置换成了男人。我当时理不清其中的逻辑。

母亲让我给她打下手。“船有什么好看的，你是运河管理处的干部啊？”

“有个女的下船了。”

“又来一个！祸害啊！该死的花街，上面为什么不找个推土机把这地方给推平了！”

母亲说“又来一个”，是因为有很多女人在花街上来来往往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花街现在是名副其实的“花街”？没有？那是你忘了。我再说一遍。

这地方原来叫“水边巷”。很多年前的名字了。因为靠近石码头，往来的船商要在这里歇脚。都是长年漂在水上的男人，见了女人就走不动，既然这样，那很好，想钱的女人就打开门，等你带着钱袋进来。生意好，大家就想来，外地的男人来，女人也来。女人在街上租下一个小院，等着男人来。水边巷就慢慢变成了“花街”。后来就只知道花街不知道水边巷了。花街就成了花街的名字。不是所有花街的女人都干那一行，如果我十四岁那时候的某个夜晚你出现在花街，所有门楼底下挂小灯笼的院子里，都会有一个柔软的身子迎接你。你摘下小灯笼，提着敲开她的门，门楼底黑下来。你进去了，然后离开。如果她还要挣钱，灯笼还会再挂出来。当然不是所有女人都愿意挂小灯笼，她们不愿意让所有人知道，那你只好通过其他途径了解。你别介意，不是说你。现在看来，其实挂不挂都无所谓，只要哪个男人想，他就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她。男人在这方面生了一只比狗还好使的鼻子。这是有一天我穿过花街，听见谁家院子里一个女人说的。当然现在已经不一样了，挂小灯笼的越来越少了，门面气派的洗头房、美容院摆在那里，露着胳膊和大腿的女孩子坐在玻璃门前，大白天她们也敢招呼你。不是说你。

那不是我十四岁那一年么。

那一年雨季漫无边际。六月刚到，梅雨就来了。在那女人来的

第二天。我记得清楚，是因为我差点把她撞倒了。

半下午突然变天，下了课太阳不见了。放学时雨正大。我没带雨具，冲进雨里就往家跑，进了花街浑身已经湿透。花街在阴雨天显得更幽深。青石板路面放出闪亮的青光，雨水一处处汪着，雨点击打路面的声音在两边的高墙间回旋。潮湿的青苔爬满半墙。当时的花街上全是老屋，瘦高，一家家孤零零地站在雨里，像衰弱的老人披着件大衣裳。檐角在半空里艰难地飞起来。墙很多年前是白的，现在布满霉斑，瓦色灰黑，瓦楞和屋脊里长出了一丛丛野草。在雨里它们看起来相当阴冷。所以阴雨天我不太愿意在花街上走来走去，买东西除外。临街两边有很多店铺，林家裁缝店，蓝麻子豆腐店，老歪的杂货店，孟弯弯的米店，冯半夜的狗肉铺，还有寿衣店、小酒馆和服装店。加上一家家的门楼，一条街挤得满满当当。

杂货店和米店之间的一个门楼里忽然走出来一个女人，我刹不住脚，撞到了她身上。她小声地叫了一下，一盆水泼到路面，铁盆咣当当响，在青石板上转了好几圈。要不是倚上了院门，她就跟盆一块倒地上了。我惊慌地看她，是昨天在石码头上见到的女人。她换了衣服，头发窝成一个鬏，好像用一根筷子插着，做了簪。我嗯嗯两声，没道歉就跑开了。我感到心慌，跑得像逃。我听见她又叫了一声，可能是我鞋子甩起的水溅到了她身上。

她在这里租了房子，没错。一定是。和昨天相比，她陌生了。不再是我似曾相识的那个侧面的脸，她成了在花街上租房子的陌生女人。而我没变，还是老样子。我突然有些生气。我把脚步沉重激烈地落到雨水路面上，没回头跑进了家门。

换完衣服，我坐在窗边看屋后树底下的两只麻雀打架。老槐树

枝叶茂密，树下那一圈土地基本上是干的。父亲看完了病人，走进来让我背前两天教给我的一个口诀，关于出血热的症状的。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想起其中的两句：皮肤黏膜出血点，恶心呕吐蛋白尿。别的打死也记不起来了。父亲又一次对我表示了失望。他习惯了。我也习惯了。父亲一直希望我能成为扁鹊、李时珍那样的旷世名医，希望我的名字能被千秋万代地传下去。而我是他的儿子，他也会被人万代千秋地挂在嘴上。可我不是那块料，在学校成绩一般。尤其这一年，父亲明确表示过，他认为我的智商正在下降，这从平常的言语行动可以看出。我反应迟钝了，动作迟缓了。看来宿生的孩子就是有问题。没错，我是两只脚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。

父亲摇着头出去了，我给自己倒了杯水，喝水的时候总是把握不好杯子的倾斜度，水洒出来，流了我一脖子，好像我弄不清自己的嘴究竟有多大了一样。这也让我生气。我闷不作声，任由水从脖子往下流。那两只麻雀还在打架，我从抽屉里摸出弹弓，拿起一颗在运河边上精挑细选过的石子。只一下，一只麻雀就躺在地上不动了。它死了，毫无疑问，我对自己的弹弓技术还是有相当把握的。这些年弹弓是我最重要的玩具，别人用鱼叉叉鱼，我用弹弓，只要那条鱼在水面上露一个头，我就会让它永远漂在水面上。另一只麻雀先是跳开，然后又跑过来，围着死去的朋友跳舞，唧唧的叫声变了调。它不停地跳，用嘴啄自己的羽毛，一根根往下扯。它以为那是件衣服，要把它脱掉。它不知道逃走。

我把弹弓放下，已经装上的第二颗石子也拿出来。我对着那只活着的麻雀嘘嘘，哄它也不走。然后开始打喷嚏，一连三个。我感冒了。

躺在床上生病是件无聊透顶的事。我想起来，但是药力让我浑身无力，动一下就觉得骨头和肉一起疼。不知道父亲给我下了什么药。父亲帮我到学校请了假，然后给我配药。他说这些反应是正常的，我已经六年没有感冒过了，所以来势凶猛。六年了，也就是说上一次感冒在八岁。我都想不起来八岁时我是一个怎样的小东西，甚至怀疑是否经历过八岁。至少我没看见八岁留给我的任何痕迹。父亲却说，八岁时整个花街都知道我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，成绩一级棒，学什么会什么。我不相信，因为“可爱”这个词让我厌恶，矫情，甜腻腻的，像电视里外国老太太抓着小女孩的手使用的词汇。我不愿意自己在看不见的八岁里可爱。

你连着在床上躺过三天没动吗？哦，没有。那真比死了还无趣。

我一整天都睁大眼看着屋顶上蜘蛛在结网，窗外雨声急缓相间，我怀疑时间已经停下来不走了。一天都如此漫长，这一辈子可怎么过。我让母亲把老掉牙的飞马牌挂钟挂到我床对面的墙上，我要看着它往前走。其实这样凉爽的天气非常适合昏天黑地地睡觉，可我睡不着，我看着钟摆在潮湿的空气里有气无力地晃荡，突然想到那些出入花街的陌生男人。他们走进花街的时候步履匆匆，当然一般都是在晚上，也有白天来的，离开的时候就像这个老钟摆，有气无力地拖着两条腿晃荡出去。我想象我是其中一个，那一定是穿风衣，竖起高领子，戴礼帽，像个冷酷利落的地下党人。可是，地下党人到花街来干什么呢。晚上九点之后，母亲是坚决不许我在花街上乱转的。

“该死的花街，有什么好看的！”她一直这么说。

如果不是那个女人，我还会在床上继续躺下去。父亲去西大街出诊了，母亲在玻璃厂上班，她的任务是从一堆酒瓶子里把有缺口的挑出来。母亲对我和父亲常常不满，应该是职业病，她对一切有缺口的东西都不放过。那个女人敲我家的门。我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。

“是你啊，”她摁着右耳朵后面的那个地方，“你是医生的儿子？哦，我头痛。”

我点点头，两腿发软。身子如同一块板结的土地，点头的时候能听见生锈的螺丝艰难地转动的声音。她的右耳朵已经不再透明。她的蓝底小白碎花雨伞竖在门槛之外，雨水从伞尖流到更多的雨水里。她穿一双塑料拖鞋，指甲淡红色，脚很白。她的玉兰花香气好像还在，在她胸部凸起的地方，另一朵玉兰花绽开花瓣。

“我头疼。”她说。

我赶紧把目光提上来，顺便把全身的力气也提起来，然后驴唇不对马嘴地说：“我感冒了。”说完我就尴尬地笑了。如果有镜子，我一定会发现，那也是会让别人尴尬的笑。

她笑起来。在笑声里我头一次发现她有一点鼻音。之前说话的时候竟然没发现。

如你所知，我那点皮毛功夫用上了。治疗头痛和偏头痛我都懂一点。就那几服药。我不生气了，我很高兴。我给她详细地讲述我所知道的跟头痛和这些药相关的知识，其中五分之一的内容是我临时杜撰的。我对这些药的价格也熟悉。不能不收钱。离开的时候她夸我真能干，到底是医生的儿子。她撑着伞跳过一个个小水坑，白白的脚后跟一闪一闪。我换个角度去看她的侧面，我有些兴奋，但